

論陽明學說對近代學界之影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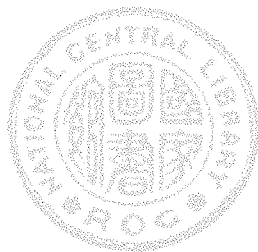
吳 蘭

壹、前言

陽明晚年專提致良知之學，明儒學案云：「江右以後，專提致良知三字。」（明儒學案一，卷十，姚江學案，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，序錄，頁四）又曰：「自姚江指點出良知，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，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，故無姚江，則古來之學脈絕矣。然致良知一語，發自晚年，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，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，說元說妙，幾同射覆，非復立言之本意矣。先生之格物，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。以聖人教人，只是一個行：如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皆是行也，篤行之者，行此數者不已是也。先生致之於事物，致字即是行字，以救空空窮理，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，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。」（同上，頁一）蓋陽明於良知學之精神流傳，貴在不僅能提出一偉大理想，且能運用知行合一之方法，向各種對象求發展。是以王門致良知之學，發展至明中葉後，已極一時之盛。

蓋王門講學，由近及遠，始從學者，不過限於郡邑之大，自謫居農場後，從游與私淑者日多，四方受業者益衆，弟子幾遍佈國中，即或社會之一般講學，亦已遍述王學，儼然成爲當代學術之主流，執一時理學之大纛。明史列傳言陽明弟子盈天下，實不虛言。

承襲陽明思想之學者，據黃梨洲明儒學案所載，自卷十一至三十六，凡一四四人；毛奇齡王陽明傳本卷二亦錄其所知者九十二人，並云：「餘執贊弟子甚衆，不可考」；余重耀陽明弟子傳纂三卷，含目錄及見於年譜、宗派、傳本、書牘者，共三百零七人。陽明門人之佈滿天下、盛極一時，由此可見矣。



以王學之遍傳國內，陽明教學成功固是其因，亦以其門人弟子不僅深受其教，且多篤信而懷傳教之志願者。然因此而門人日盛，是使陽明不能一一顧及，後至者或由王門弟子等以言以教，加之私淑者，再傳者，而渠等多因不諳于陽明之義理，而自行鑽研，是雖皆有其個人之體會處，終因各人於體會不同，取捨互異下，致孳衍紛歧，玄易難同。是衍至末流，遂成爲狂禪，而與陽明學之精神相去日甚，終陷陽明學於末流之弊矣。俟明代大師黃梨洲集結明代學術，並以其博大精深之思，超出門戶之見，爲陽明作辯，其解說既清楚，理由復充分，是還陽明學於正位矣。

貳、對清末民初學風之影響

迨至滿清末年，因朝綱不振，國勢積弱，復以列強侵略，禍心已揚，使此一老大國家，倍受欺凌、瓜分之苦，生民煎熬，如火似荼。基於民族大義，民間由是自覺，凡事提掣已精神，以應付瞬息萬變之世局，以是逐漸孕育出一股堅定之革命思潮，終而匯成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之一股巨流。其影響所及，不僅改變中國政治——推翻滿清建立民國，且重建中國哲學——由知易行難而爲知難行易。

而清末民初之思想界蛻變如是之速，還在於潮流使然。時西學東漸，舊學動搖，有志之士面對此一空前遽烈之轉型期，已急於披拾維新圖強之道，於是，內容豐富，具有西洋哲學所具之人生觀、道德觀、認識論、宇宙論，而且境界高超、言他人所未言、悟他人所未悟之陽明哲學，漸又成爲思想之主潮。

時受其影響較深者，如著名學者康有爲，其於一八九一年開始以一派宗師、思想政治禮教之大改革家，講學於廣州萬木草堂。其平生服膺學派仍是陸王之學，晚年揭「不忍」爲其獨辦刊物之名稱，所謂不忍亦與孟子惻隱之心、陽明良知之說較接近。

康有爲弟子梁啟超思想亦傾向陸王，於早年赴湖南時務學堂講學時，亦以講陸王修養論爲主，曾選有節本明儒學案，其重心旨在揭示王學之精要，後又著「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」，以發揮陽明哲學。

自晚清新文化運動以來，倡導陸王之學最得力者，當推梁漱溟。梁漱溟於民國十年發表論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一書，對儒家思想之辯護及發揮，嘗居於陸王學派之立場，提出「銳敏的直覺」，以發揮孔子仁學與陽明良知學。



熊十力深得朱陸精意，融會儒釋，自造「新唯識論」，對陸王本心之學，發揮爲絕對待之本體，且本翕闢之說，而發展設施爲宇宙論。又用性智實證，以發揮陸之反省本心、王之致良知學，唯對「本心卽理，心者理也。」一點，尙少直接發揮。

馬一浮講心與物及心與理之關係，尤能調和朱陸而得其匯通，其釋朱子格物窮理之說，以朱子並未以理在外，以挽救朱子向外窮理之支離處，然仍較重視陽明「心外無物，心外無理，心外無事」之心學。（注一）

叁、陽明學說與孫文學說

一、國父對陽明學之批判

吾人研討「孫學」與「王學」者，乃在孫學之哲學思想——知難行易，及王學之哲學思想——知行合一方面而論。

國父與陽明雖相距三百多年，所處時代各有不同，而於哲學上，皆對知、行問題加以研究，並有可比較之處。國父於孫文學說中，對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，曾有所批判，綜其意見，爲下列三端：

(一)無補於世道人心

國父指出：「若夫陽明『知行合一』之說，卽所以勉人爲善者也。推其意，彼亦以爲『知之非艱，而行之維艱』也。惟以人之上進，必當努力實行，雖難有所不畏，既知之，則當行之，故勉人以爲其難，遂倡爲『知行合一』之說，曰：『卽知卽行，知而不行，是爲不知。』其勉人爲善之心，誠爲良苦，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，以難爲易，以易爲難，勉人以難，實與人性相反，是前之能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。』今反爲此說所誤，而頓生畏難之心，而不敢行矣。此陽明之說，雖爲學者傳誦一時，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。」（注二）是國父以爲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說，其用心良苦，無如未將「知易行難」之說打破，故不能鼓勵實踐，仍無補於世道人心。

(二)不合於實踐之科學

國父言：「夫『知行合一』之說，若於科學發明之世，指一時代、一事業而言，則甚爲適當；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，



則殊不通於今日矣。以科學愈明，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，不獨知者不必自行，行者不必自知，即同爲一知一行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，亦有分知分行者也。然則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，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。」（注三）是 國父以爲陽明知行合一之說，不合乎科學時代之分工。

（四）無助於日本之維新

國父認爲「維新之業，乃全得師夷之功，是日本之維新，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與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，實風馬牛不相及也。倘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，果有助於日本之維新，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，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，而效果異趣也。此由於中國習俗，去古已遠，暮氣太深，顧慮之念，畏難之心，較新進文明之人爲尤甚。故日本之維新，不求知而便行，中國之變法，則非先知而不肯行，及其既知也，而猶畏難而不敢行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爲尤難故也。」（注四）是 國父以爲日本維新，得力於西洋科學，非陽明學之功。

以上乃 國父論陽明知行合一之用意及其理由。就中論陽明說不合實踐之科學方面，乃 國父論陽明知行合一之最後一段話，關係重要，試予以解說如后。

國父於此段話中表明科學愈發達，知行愈分立，「知者不必自行，行者不必自知。」亦即謂當有爲知者，有爲行者。例如政治學家是知，政治家是行；前者理論，後者實踐。同時，知、行又甚複雜，非分工不可。蓋所謂「知」、「行」者於政治學方面，有理論、歷史、行政、外交等等之分；而政治方面，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等機關，於行政方面復有內政、外交、國防、教育等機關，總之爲分之又分。是以要知行合一，只有就時代與事業而言，一時代之知與一時代之行乃合一也，此爲 國父之看法，是以 國父主張整體之「知行合一」，不贊成陽明之個人「知行合一」。（注五）

然則所謂知、行問題，端在理論與實踐之問題，此於中外哲學史上，皆佔重要地位。其雖不屬政治哲學之範圍，然却與政治與實踐關係密切。蓋一種政治運動或社會革命，無不涉及理論，而其能做到與否，則與實踐有關。試觀當年陽明創立「知行合一」之用意，第一在「勉人以行」，第二爲「致良知」。勉人以行者爲陽明學「知行合一」學說之目的，亦陽明最初之用心；致良知爲陽明匡世救弊，使入至善之旨。然所謂「致」即「力行」，是以陽明學說之本旨，乃在要人去「實行」。而 國父倡「知難行易」一學說之目的有二：一爲破畏難之習，成革命之業；二爲振學業之風，立力行之基，以完成其救國主張、革命主義。在「



孫文學說」中，反覆闡明「能知必能行」，「不知亦能行」道理，歸納出「行易」之結論，其最後目的即在使吾人遵其所定革命方略、計畫，及其命令實行。是以陽明及 國父二者創立學說之宗旨言，其目的皆是要人去「行」。

就以上三點而論之， 國父對陽明之批評似頗嚴厲，而究其批判之真意及目的而言，則祇有一個，即在克服人們「畏難之心」而已。是以 國父於孫文學說第一章即開宗明義指出：「蓋『行之維艱』一說，吾心亦信而無疑，以為古人不我欺也。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，以達吾建設之目的，於是以陽明『知行合一』之說，以勵國人。惟久而久之，終覺奮勉之氣，不勝畏難之心，舉國趨勢，皆如是也。予乃廢然而返，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，以研求其究竟。……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之非難也，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！」（注六）於此說明 國父雖覺陽明知行合一之說，可激勵奮勉之氣，而終不勝畏難之心。然則如何而可根本克服此一「畏難之心」呢？其癥結所在，為單純之知行合一，於事實上不夠發揮，蓋「能知必能行」（知行合一），「不知亦能行」（知行分工），惟有補之以知行分工之說，始能概括「不知亦能行」之事實。吾人確信「不知亦能行」，適足證明知難而行易，畏難不行之心，自可予以克服。同時，於科學昌明之世，專講知行之合一，而忽略知行之分工，顯然不合實用。是科學之實踐既於知行分工，知者不必自行，行者不必自知，則自不至而有畏難不行之心理。

總之， 國父舉「知難行易」與「知行分工」，目的在於補救 明知行合一說之不夠用與不合用，以克服人們「畏難之心」，以推進革命之建設。由是益信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，非但無有衝突，且可相得益彰。

二、 國父論知行之問題

先總統 蔣公推崇陽明學說，不遺餘力，曾屢次闡釋其對孫文學說與陽明哲學綜合研究之所得，歸納言之：一是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者於知之本體雖不同，而重「行」之目的，則完全一致；二是陽明不否認知難，而 國父未忽略致良知；三是 國父處于革命造端之始，又適於科學昌明之時，而陽明則處於科學未發達之時代，環境完全不同；四是陽明學說並非唯心之論；五是陽明知行合一之說，事實上確有助於日本維新；六是吾人應以知行合一來輔益知難行易，始能使孫文學說大行，以使國人更易於無所畏而樂於行；七是惜未及於 國父生時，當面請示與討論此一學術上之重大問題。

就學理而言，吾人欲瞭解陽明知行合一之說，是否含有「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」之用意，及知行能否與應否合于一人之身，



則必須從基本上研究知行合一與知行難易之關係上著手。吾人以爲就「知行合一」與「知行難易」上應有三種不同之關係，一是知行合一之本體上，無難易區分；二是於未致良知之前，是知難而行易；三是於致良知之後，是知易而行易。試就其二者關係略述如后：

(一)就知行本體言

陽明曾對其得意門弟子徐橫山強調認清知行本體之必要。據陽明年譜所載：「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，決於先生。先生曰：試舉看。愛曰：如今人已知父當事，兄當弟矣，廼不能孝弟，知與行分明是兩事。先生曰：此被私欲隔斷耳，非本體也。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人復其本體，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：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，夫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色時，已是好矣，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臭時，已是惡矣。非聞後而始立去惡也。又如稱某人知孝，其人知弟，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，此便是知行之本體。愛曰：古人分知行爲二，恐是要人用具有分曉否？先生曰：此正失却古人宗旨，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，行實知之功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實知之成，已可理會矣。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，緣世間有種人，懵懵然，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、省察，是之謂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而後行無謬。又有一種人，茫茫然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是之爲揣摩影響，所以必說行而後始真，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。若見得時，一言足矣。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行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，俟知真時，方去行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，某今說知行合一，使學者自求本體，庶無支離決裂之病。」（王陽明全書四，卷一，年譜，頁八五）

基此，可知陽明所倡之知行合一，是就本體而言，能復其本體，始可以言知行真正合一，知行既然合一，則根本無難易之可分也。如好好色，所謂只見好色時，已是好矣，此其間即知而即行，見好色之知與好好色之行，根本成爲一體，決無難易之分，此爲甚顯然之道理。又如說：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可證一開始知，即已開始行，行之過程，亦即知之過程，知與行分明是一件事，不是二件事；既是知行於本體上合一而不可分，又何從而比較其難易？故知 國父對陽明之知易行難之雅意，並非就知行之本體而言之。證之 國父於「知行總論」中云：「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，可分爲兩時期：周以前爲一進步時期，周以後爲一退步時期。」（注七）蓋而自秦併六國後，「政府一天專制一天，不是焚書坑儒，就是興文字獄。」人民知行方面，從此感受束縛；漢承秦火之後，典章文物，散失不全，訓詁之學，應運而起，因此，「便是述而不作，坐而論道，把古人的言



行文字，死讀死記，另外來解釋一次，……你一解釋過去，我一解釋過來，好像炒陳飯一樣，怎樣能將有進步呢！」（注八）從此，祇重經典注解之知，不重創造發明之行，文化自而退步，國運當轉衰弱。

由是可知，國父提倡「知難」之目的在「貴知」，提倡「行易」之目的在「重行」，可謂知行兼顧，或知行並重，是以就知行本體言，無難易區分。

（二）就致知之先後言

國父論知行關係思想，是以知難行易為主題，以知行難易之比較為中心，伸展及於知行先後問題、分合問題、輕重問題之解決，於此，吾人可先就陽明之說法論之。陽明曾指出，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，是古人不得已之教，意謂如若離開知行之本體，自可區分為致知以前之知，與致知以後之知，則其為知之難易，自然各有不同。須知「良知」未為物欲掩蔽時，就其本質上看，固是「不慮而知，不學而能」。然則人人之良知，皆不免為物欲掩蔽，「致良知」者，乃在除去此種物欲，候其良知之本然之善，而尤須經過一段「致知」之歷程，誠非易事，連陽明亦深覺困難。於此，陽明曾陳述其致知之艱難經過：「吾幼時求聖學不得，亦嘗篤志二氏，其後居夷三載，始見聖人端緒，悔錯用功二十年，二氏之學，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，故不易辨，惟篤志聖學者，始能究析其隱微，非測億所及也。」（注九）可見「致良知」之聖學與仙佛二氏之學，相差毫釐，而竟用功二十年，始能究其隱微，其不易辨之程度如是。陽明又嘗謂九川曰：「某於此良知之說，從百死千難中得來，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，只恐學者得之，實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，不着實功，負此知耳！」是以此良知之「致」，是從百死千難中方體悟出來，其艱難自是一端。

又據載陽明某次答人問良知之一首寓意之詩，詩云：「良知即是獨知時，此知之外更無知，誰人不有良知在，知得良知却是誰？」此詩中所謂「知得良知」之「知」，便是屬於知識論之「知」，足證「知得良知」之知，實不易也；再者陽明曾與黃緒更具體討論到致知之前之知是難，致知之後之知是易。陽明日：「聖人之心如明鏡，纖塵自無所容，自不消刮磨，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，須痛自刮磨一番，盡去駁蝕，然後纖塵即見，纔拂便去，至於堆積於蝕駁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知困勉之所由異，幸勿以為難而疑之也。凡人情好易而惡難，其間亦自由私意氣習纏繞，在識破後，自然不覺其難矣！」是以於「致知」過程中，正如「斑垢駁蝕之鏡，須痛自刮磨一番」，此不亦「知之維艱」？然當「致知」之後，就如「盡去駁蝕，然後纖塵即見，纔拂便去。」所謂「在識破後，自然不覺其難矣。」此又是「知之匪艱」也。



是以，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理論中心，乃在「知」之者，當實踐其「知」；此亦陽明創立「知行合一」，勸人以「行」之力理論。由是可知，「知行合一」雖是以「知」為起點，最後則在以「行」為目的，要人人實踐其「良知」，以福利人羣，而促進社會進化。

吾人從研究孫文學說之分析所得，知其中所言之「知」，乃指從感知（感覺）、聞知（見聞）發展而成為學理之知；「行」是指本能行為、習慣行為，與由此本能習慣發展而成為受知識指導之有意識行為。是以如要於「知」與「行」上比較難易者，則「知」之本身有各種不同之知識，此知識有難有易，而「行」之本身亦有各種不同之行為，此行為亦有難有易，是以「知」或「行」本身各自之難易，皆不在 國父所論比較之列。

當然，國父並非不知「行」有其本身難處，然就同人同事以觀，如說行之難，則知之更難，且行之困難亦得歸因於知之困難。蓋於今科學昌明時代，知識之難關一過，則行之易矣。國父為證此，而提此知難行易之十事功以證明，先舉飲食、用錢、作文三證，國父曰：「其一為飲食，則人類全部行之者；其二為用錢，則人類之文明部分行之者；其三為作文，則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。」（注十）此三大例證已包括之自然、社會、文化三大存在範圍，皆是行易而知難。只此三例，已足夠證明力量，再加上其他七事為例，乃是加強證力而已。而此七事，建屋、造船、築城、開河、電學、化學、進化論，復包括物質世界、物種世界，人類世界之範圍，亦即包括整個宇宙進化之三大層次。是以 國父將事功十證連同心性一證提出之，是「行易知難」已然肯定矣。

國父又就「以不知而行、行而後知、知而後行」。三時期之進化階段說，指示「知行並進」，以解決知行先後問題。國父以為：「先行後知，進化之初級也，先知後行，進化之盛軌也。」（注十一）於科學未明時期，是行先知後，於科學昌明時期，是知先行後。是以「當今科學昌明之世，凡造作事物者，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，所以然者，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，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。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，從意象而生出條理，本條理而籌備計畫，按計畫而用功夫，則無論其事如何精妙，工程如何浩大，無不指日可以樂成也。」（注十二）然則，於科學時期中，仍有許多事為不知而行、行而後知、行先知後者，是以 國父指明：「然而科學雖明，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；其不知而行之事，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也。」（注十三）



總之，此三時期，由行而知，因知更進於行，此「行——知——進行」之關係，是由行推進之，由知推進行，乃是一個知行互相推進之關係，即是「知行並進」之關係。

由上述「知行合一」與「知行先後」關係中，可知國父所謂推其意，彼只以為知之匪艱，而行之維艱也，所指者既非知行本體，亦非「致知」之前之「知難」，推其意，當指「致知」之後之「知易」而言，亦即國父「知難行易」理論中「能知必能行」、「不知亦能行」之勉人去行之「行」，是「不知而行」之「行」，亦即「不知亦能行」之「行」。此乃就人類之進化，皆起於不「知」而「行」；是以要國人以「行」求「知」，由「知」再進於「行」，以求社會國家之不斷進步發達，藉不斷之充實人生，而福利人羣。因此「知難行易」之起點，雖在於「行」，目的却在於「知」，然則「知」之獲得，當靠「行」之力量。

故國父「知難行易」之立論重點，完全在「行」，而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「行」，是「因知以進行」之「行」，亦即「能知必能行」之「行」。是以歸納之，國父「知難行易」與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起點，雖說一為「知」，一為「行」，各有不同；然「知難行易」勉人以「行」求「知」；「知行合一」助人以「知」付「行」，是其終點，皆在一「行」字，二者求「行」之目的皆相同。

三、先總統 蔣公就陽明「知行合一」（致良知）道理，以闡明 國父創「知難行易」學說之目的在完成革命救中國

辛亥革命成功後，一般黨員對國父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，無深刻之瞭解，以為國父理想太高，不適合中國之用（注十四）國父始思同志之所以有此見解，並不全是因革命成功、目的已達而改變意志，實因思想錯誤而來。此錯誤之思想，乃殷傳說「知難行易」說。是以國父乃開始研究「知」與「行」孰難孰易，「知」對「行」的影響究竟如何。

始初，欲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，惟久而久之，「終覺奮勉之氣，不勝畏難之心」（注十五）而認為陽明「知行合一」固在勉人為善，用心良苦，然仍不能鼓勵實踐，不能破「知難行易」之說，乃倡「知難行易」說以鼓勵國人實行。

雖則，根據前述，可證陽明「知行合一」與國父「知難行易」於精神上仍有其相通處；先總統 蔣公亦指出：「總理『知難行易』學說，和陽明『知行合一』學說，徹上徹下，只是一貫。」（注十六）試歸納如后：



(一)能知必能行，即包含知行合一之道理。

蓋能知必能行，即真知必能與行爲合一之意，如有人問能知而未必能行者，其故安在？則必須藉陽明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」之說以解答之，故能知必能行與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」，皆是知行合一論之二種不同說法。

(二)國父力言「以行而求知，因知以行」之知行合一並進，爲近代文明進行之特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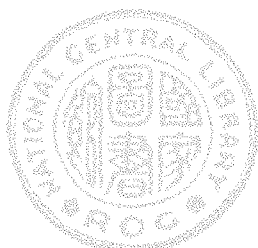
蓋以行而求知，即由行以求與知合一。因知以進行，即由知進而求與行合一。且「因知以進行」即包含陽明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」之精意。足見「知行合一」乃國父所特別注重而有新發揮者。（注十七）是國父意在融會陽明知行合一學說，並灌注以近代精神，以應用於革命之偉大事業。

至於陽明「致良知」說，更爲國父所重視而時加闡揚。國父謂：「強權固爲天演之進化，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。」（注十八）其主張革命志士當本良知以行公理，爲社會除不平，即包含陽明「良知就是天理」之精意。

關於此點，先總統蔣公於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」一文中曾簡明直捷指出：「總理最後在日本一篇講演，便是講王道，那是說我們中國講王道，日本講霸道。王道就是中庸之道，不講侵略，不講強權，完全是講公理。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同基礎，都是從這個哲學得來的。大學中庸之道是什麼？是孔子之道。孔子之道，至漢儒而支離，至宋儒而空虛，至王陽明而復興。」（注十九）基此而闡「陽明」知行合一的「致良知」學說，是與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，不惟不相反，而且是相輔而行的。亦惟有致「知難行易」的良知，纔能實現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。」（同上，頁五七八）

先總統蔣公指出：「今天要說明『知行合一』『致良知』的道理，來闡明我們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。譬如我們要問怎麼叫『致良知』。那就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。現在就拿『愛國』來說：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，應該爲他的國家來犧牲。愛國家，爲國家犧牲，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爲應該做的事情，這就是良知。但是有些人知道……，而却不能……，這就是不致良知。又如說……：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，復興中國，完成革命，並沒有什麼困難，只是在我們的一念。……這就是致良知。中國能夠個人致良知，就可以拯救中國。（同上）

「今後救中國的藥方，當然是我們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。而要闡明這個哲學，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『致良知』三個字。……古人說：『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』，這個惡臭與好色的良知，是人人所有的，不過要實在去惡和去好，這就是叫致良知。



如果好惡相反，那就是不能致良知。……祇有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乃可以救中國，只有能夠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。」（同上，頁五七九）

「總理生在滿清末年，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，同是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『知易行難』學說的毒，一般士大夫，不是學漢儒解經，就是學宋儒講性，結果只是空疏迂闊，無補實用，所以王陽明使用『知行合一』的學說，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，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，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。……總理常講：『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，不要再求另外的知』。他的意思即是：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，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，……因為跟着去『行』是很容易的。……王陽明所講『良知』的知，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，不待外求，而總理所講『知難』的知，是一切學問的知識，是不易強求，而知識的『知』，不必人人去求，只在人人要『行』。我們理解了這點，便知總理所講的『知難行易』的知，同王陽明所講的『致良知』與『知行合一』的知，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，完全是一致的……我們今天要救黨國，沒有旁的，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，本着我們自己的良知，照著我們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去做，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。」（同上）

「今天所講的『致良知』三個字，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要緊的『心法』，不但不與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相反，而且這兩個學說，是互相闡發，實有相得益彰之效。如果我們僅是講『良知』而不講『致』，那就像宋儒一樣，不免落於空虛。陽明所以要在『良知』上加一個『致』字，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切實體驗。所以『致』就是『行』，致良知是證明『行易』，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。這就是大學的道理，也就是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道理。」（同上，頁五八一）

先總統 蔣公指出，陽明用知行合一學說，以治當時中國之民族性；國父更進一步以知難行易，以啟中國之民族精神，發而為其革命之原動力，兩相對比提示，可知陽明學說與國父思想之關係密切。而證之上文，欲致良知是何等之簡易，正如陽明之本旨；復由致良知而真切感到「抵抗敵人，復興中國，完成使命，並無任何困難。」此不啻國父「行易」之說之有力說明，是國父重視陽明學說，可想而知。因此，先總統 蔣公之指示：「如果我們能夠趕快把固有的民族精神『致良知』的哲學收回轉來，實行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以『知難行易』為我們思想信仰的中心，那末，革命是一定成功，中國是一定會復興的。」（同上，頁五八二）實深是也。



肆、陽明知行合一學說對先總統 蔣公力行哲學之影響

一、先總統 蔣公何以重視陽明知行合一哲學

先總統 蔣公之重視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，由來已久。早在 蔣公年輕時，即服膺陽明學說，嘗自述：「王陽明『知行合一』的哲學，我是自十八歲從讀顧葆生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，以後五十年來，更會讀了再讀，研究了再研究，他的『傳習錄』與『大學問』這兩個小冊子，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，心嚮神馳，不知樂之所止。」（注二十）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於南京中央軍校講述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」時，並一再闡揚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之意義與重要；此後凡諸多訓詞中，特別是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訓詞，對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之精義，分析得更為精關透徹，是以可謂陽明思想與 蔣公淵源極深，影響復大矣。

先總統 蔣公所以如此重視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，筆者以為應有三點理由，試分析如后：

(一) 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乃復興儒道最得力之哲學

先總統 蔣公以為，孔子之道，至陽明才得以復興。儒道之復興，是得力於陽明，然則陽明因何憑藉而復興儒道？關於此問題， 蔣公闡發甚簡明，而曰：「儒道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的哲學。然而陽明又為什麼提倡知行合一一致良知的哲學？因為在王陽明時代，一般士大夫的學問，多是空疏迂闊，無補實際。……加之佛學空寂玄妙之說，汨沒了理性。」（注二一）是以陽明乃創立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學說，一面「去其外誘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。」一面「求其反身而誠，強恕而行。」以期改造只能「坐而言不能起而行。」只能「坐而論道不能起而行道」之傳統積習，以治當時中國民族性之弱點，及一般士大夫心理上之病根。由是可知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之重要性。是以 蔣公認為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，不僅是「自己立國的精神」。並為中國「固用最優的武器。」此為 蔣公以歷史眼光，從儒道興衰之歷史方面闡明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之重要，亦為 蔣公所以特別重視陽明知行合一一致良知哲學之第一個理由。



(一)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乃爲實現知難行易學說最有效之哲學

先總統 蔣公指出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學說，與 國父知難行易學說，不惟不相反，而且是相輔相成，相互闡發、相得益彰也。蔣公於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訓詞中因就「王陽明所講的『良知』的知，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，不待外求，而 總理所講的『知難』的知，是一切學問的知識，不易強求的。」（注二二）而謂「其爲知的本體雖有不同，而其用意是要人去行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，是完全一致的。」（同上）蔣公並進一步分析：「王學的主意是一個致良知的知字，但王學的工夫，還是歸結到一個行字，亦就是致良知的致字——致知必在於行，不行不可以爲致知。」講到我們 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則尤其是着重在行——「能知必能行，不知亦能行。」（同上）因此，蔣公強調「要闡明知難行易的學說，就是要用現在的致良知三個字。」（同上）是唯有能致知難行易之良知者，始能實現知難行易之學說。

而 蔣公所以有此論斷，並非憑空杜撰，實是 蔣公自十八歲始讀陽明學說，五十年來不斷研究，以迄「這五年來，都在不憚反覆的研究，總認爲我們要貫徹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必須輔之王陽明『致良知』的哲學。務先做到知行合一，然後才能由勉強而行之，進到安而行之，利而行之，以達到知難行易的真實境地。」（同上，頁一九〇八）之透徹研究之成果。此爲 蔣公從實現 國父知難行易學說方面闡明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之重要，亦爲 蔣公所以特別重視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之第二個理由。

(二)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是實行三民主義最緊要之心法

先總統 蔣公會引述 國父言：「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，那你就只要照我的『革命方略』去做，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，就一定可以完成革命了。」（注二三）意爲能知三民主義、革命方略是好的，就是「良知」；能照三民主義、革命方略去行，便是「致良知」。能夠致三民主義之良知，則革命必成。如若「全國的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『行易』方面去做，祇是向著『知難』方面去求，這就是不能『致良知』，亦就是不能行」（同上）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。」（同上）是以 蔣公乃強調：「我們今天要救黨國，沒有旁的，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，本著自己的良知，照著我們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去做，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。」（同上）誠如 蔣公於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廿日總統就職典禮中所言：「現階段在民族大義上，正不啻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延續——因爲只有扭轉了這危急存亡的時刻，五千年歷史文化才得以綿延隆盛……」（注二



四)然則，「今日自由基地，正是所謂『退此一步，即無死所』」(同上)之地步，因此唯有以堅定之意志、強韌之毅力以行之，始能堅守陣地。而陽明思想正是從艱危之百死一生中體驗徹悟而得，是其「良知」足以忘患難、出生死；其「知行合一」足以振頹弊、起疲衰，足發振奮人心之功效。是以三民主義能否具體實現，端視吾人力行之信心與決心也。此即為 蔣公自實行三民主義方面闡明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重要，亦即 蔣公所以特別重視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之第三個理由。

二、先總統 蔣公力行哲學係陽明思想之演進

先總統 蔣公之學術，窮究天人之際，貫通古今之變，是其思想自成一完整之體系， 蔣公並為一哲學家，於中國哲學方面，尤於宋明理學，鑽之甚深，並融會貫通，於陽明學之造詣尤深，是 蔣公對其哲學常名之為「力行哲學」(注二五)

就 蔣公力行哲學之認識論而言， 蔣公主張知行合一，以「行」統合理性與經驗，從力行中認得真知；以真知貫徹力行。蓋哲學上之所謂認識，指含有判斷之「知」之作用，是陽明知行合一學說，及 國父知難行易哲理，導發 蔣公哲學思想一個新底淵源；體認人生之「生」實包含兩重意義，一曰生命，二曰生活，而生命與生活，即是人生之意義。是以人生自少至老，於宇宙間並無一日可脫離行之範圍，可以說人是於行中成長，由「行」而充實了人格，提高了人格，是以「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」(注二六)

蔣公此言之重要性，在清楚表明人生由「行」而存在，「力行」即人生存在之出發；同時，人生由「行」而充實與提高，「力行」又是人生進步之根源。因此，力行哲學不僅為人生哲學，同時亦是教育哲學。蓋教育最要緊之精神貴在實踐力行。藉此，蔣公並參合易經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說，認識出「行」之真諦，指出「行就是天地間自然之理」，「行就是人生」，人是「由行而成」。

前曾述及， 蔣公自年青時即鑽研陽明思想，後留學東瀛，親睹日人用功之勤，舉凡出外旅行，幾乎人手一冊，用心研讀陽明傳習錄，街巷書肆更是充斥有關陽明哲學書籍，因悟日本以蕞爾小國，竟能致強，實乃陽明「致良知」與「即知即行」哲學有以致之。是以 蔣公自此即偏重陽明學說，並認為國人欲革命救國，必以奉行陽明學說，效法陽明「即知即行」、「篤實踐履」之精神為起始，始能復興民族，強盛國家。



後 蔣公自日歸國，對陽明學說仍續研不輟，民國二十年，九一八事變爆發，日本大肆侵略中國，蔣公乃深體欲抵抗日本帝國主義，當先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，而所謂武士道精神，乃以我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哲學為基礎（注二七）因而再度研究父學說與陽明哲學之異同，發覺二者之本質於「行」之意義上並無出入，並因 國父「知難行易」學說破古人「知之匪艱，行之唯艱」之成見，從此可使國人「勇於行」，是以 蔣公即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，於南京中央軍校講演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」一文，指出 國父發明「知難行易」原理，完全要我們注重「行」字，同時指出「古今來宇宙之間，只有一個『行』字纔能創造一切。」同月二十三日復於同地講演「革命哲學的重要」時，並將 國父「知難行易」與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二種學說併稱「行的哲學」，且因此而形成其「行的宇宙觀」與「力行的人生觀」。然則，何謂力行？簡略之，力行即「行中有知」及「知中有行」之行，亦即「行之以求」及「知以進行」、「知行互進」之行，同時並為人與環境於一定目的中，「互相作用」、「互相推進」之行。

關於提出「力行」之意義，蔣公於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一文中，有詳細之解說。蔣公曰：「我在二十年前，提出『力行』兩個字的時候，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幹部『沉滯不進，畏難却顧』，所以要提出『力行哲學』，大家一起來力行！到三十八年……我又提出了『實踐』兩個字，這是為著鑒於我們大陸失敗，是失敗在幹部『虛浮不實，自欺欺人』的上面。以此要用『篤實踐履』來補救。」（注二八）

蔣公進而又曰：「由『力行』到『實踐』，從根源上來說，也就是……大家今日要能『實踐』，就要從『言行合一』做起。大家要能『力行』，更加要從『知行合一』做起，我們必須言顧行，行顧言；因勉精進，即知即行；始能做到實踐和力行。也唯有如此，乃能達到 總理『使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』的目的。」（同上，頁一八九九—一九〇〇）

是以 蔣公乃提出行之本能乃與生俱來，無論是上智之「安而行之」，或中人之「利而行之」，或資性稍次之「勉而行之」，但只要肯「力行」，則便能增進「利他」、「愛人」之本能，是此「力行哲學」者，端是「道在行而已」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，蔣公又復於重慶中央訓練團講演「行的道理」，不僅對「知」「行」道理作成完成之體系，並就其經歷多年艱險失敗後所獲之心得，闡明「能知必能行」與「不行不能知」之意義，勉勵國人唯有篤行纔是力行，亦唯有力行纔能無所謂難事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蔣公於臺灣復行視事，於七月三十一日至陽明山莊講述「總理『知難行易』學說與陽明『知行合一』哲學之綜合研究」一文；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五日及七月十二日復於陽明山講述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一文，於二文中同時就陽明哲學與國父學說之異同處，提出二學說之比較，歸納而為二思想同樣重視「行」之精神，並強調陽明不否認「知難」，國父亦不忽略「致良知」。

而於其觀察之透徹，比較之細密中，正足以說明蔣公對陽明學說與國父學說之融會貫通，並深得其精髓矣。而就其「力行哲學」，一如陽明之「知行合一」與「致良知」說之全然發自心性之修養，並印證自人生體驗而言，蔣公對陽明哲學實深有真切之默契與體悟，可謂受陽明影響大矣。基此，蔣公能自「力行」處以證實「行易」；進而以「力行」打破「知難」之關，而發揮陽明「知行合一」學及國父「知難行易」說之偉大成果也。

伍、結 論

宋明理學乃中國哲學之第二個黃金時代；朱子集理學之大成，陽明則致理學於顛峰。蓋宋明兩代，所謂儒者——士大夫之流——泰半跳不出詞章、功利、訓詁、帖括之圈，講理性者，亦只是終日教人懸空靜守，槁木死灰；講功利者，更只是勞勞擾擾，終日坐利欲膠漆盆中。

當是之時，陽明為救時弊，乃佈「致良知」之教，首倡「知行合一」說。其後，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，建立民國，鑒於「知之匪艱，行之惟艱」說深入人心，牢不可破，特倡「知難行易」說，以破此心理之大敵，而出國人思想於迷津，開心理建設之大路，故於我國思想史上，陽明「知行合一」說與國父「知難行易」說，已成為極有價值之思想理論。先總統蔣公於「革命哲學的基礎」一文中指出：「我對於革命哲學基礎，只認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為我們革命不二法門。不過我認為要使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大行，還要輔以王陽明『知行合一』的哲學，才能更加容易的使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。」（注二九）並進一步著「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」，以說明二者之異同，及互相補益之關係；又著「行的哲學」，發揚行之奧義、淵源、原動力與要素，及行之目的與法則等，以為知難行易學說之補充，總稱為「力行哲學」。是影響近代最大



、貢獻最多之二大偉人——國父與先總統 蔣公，其思想淵源來自中華道統，尤其陽明哲學，影響最大。

附註：

注一：參考賀麟，「當代中國哲學」，臺灣時代書局，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出版，頁一—十四。

注二：國父，「國父全集」，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，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，一，孫文學說，第五章，知行總論，參一一四〇。

注三：同上，參一一四一。

注四：同注二。

注五：任卓宣先生於「國父論陽明知行合一之分析」中指出，陽明之知行合一個人的知行合一。前面引語，無不證明此點。最明白者，乃引「大學」：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後所言：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；只見那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；只聞那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。……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饑，必已自饑了。知行如何分得開？此便是知行的本體，不會有私意隔斷的。」凡此，無不明白 國父以陽明之知行合一，乃是個人之知行合一。

注六：同注二，第一章，以飲食爲證，參一一一五。

注七：同注三。

注八：同注六。

注九：王守仁，「王陽明全書」，正中書局，民國四十二年十月臺初版，四，年譜，卷一，年譜，頁九一。

注十：同注二，第四章，以七事爲證，參一一三二。

注十一：同上，參一一四二。

注十二：同上，第六章，能知必能行，參一一四五。



注十三：同上，第七章，不知亦能行，參一一五七。

注十四：同上，第一章，以飲食爲證：「先生之志高矣，遠矣；先生之策，闕矣，深矣，其奈『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』何？」，

參一一一五。

注十五：引用注六之言。

注十六：先總統 蔣公，「蔣總統集」，國防研究院，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臺初版，第二冊，革命教育的基礎，頁一九一。

注十七：同注一，作者引用其所著「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」一書，頁十四、十五。

注十八：同注二，關於三民主義之著述與演講：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，壹一九三。

注十九：同注十六，第一冊，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，頁五八二。

注二十：同注十六。

注二一：同上，第一冊，中國的立國精神，頁五八九。

注二二：同注十六。

注二三：同注十九所引用之部分，頁五七九。

注二四：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，第五任總統就職辭。

注二五：先總統 蔣公於「行的道理」一文中，稱「行的哲學」；於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一文中，稱「力行哲學」；於「哲學與教育對青年的關係」一文中，亦稱「力行哲學」。

注二六：同注十六，頁一一一三。

注二七：同注十六，先總統 蔣公於「革命哲學的重要」一文中指出：「日本就是以『武士道』爲其立國精神，以『致良知』爲其民族的哲學。」

注二八：同注十六，頁一八九九。

注二九：同注十六，頁一九〇七。

